美国动态（半月刊）

2022年8月20日（第266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危机对超级大国而言亦是转机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博弈时代。危机固然可怕，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通过外交较量与军事对抗能够洞悉对手意图，厘清地缘政治竞争的利害关系。危机亦能带来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机会，可以促成倡议与投资，帮助美国在未来旷日持久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中美关系

美国应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

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网站 8 月 5 日登载剑桥大学国际研究博士约翰·布雷克（John Brake）的文章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保持克制，避免危机升级。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美国明确表示希望避免危机，但自冷战以来，对展示决心的执念已经融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传统观点认为在对抗中退缩可能会使对手有恃无恐，并引发进一步挑战。然而，若是与对手针锋相对则可能导致危机升级。拒绝迎合对手的挑衅并不意味着软弱，也可以是一种良性的克制信号。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源于其克制力。美国应保持克制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克制必须基于实力，否则只会被视为无能或优柔寡断。美国存在实力优势，强调这一点能削弱大陆军事演习的象征意义。

第二，克制应有原则性，而非狭隘的利己主义。美国激怒了中国大陆，但不能让地区盟友承担后果。对此，美国应将自己定位为安全现状的捍卫者，避免冲突升级威胁地区稳定。具体来看，尽管美国政府强调佩洛西的访问并未损害其“一个中国”原则，但拜登本人仍有必要再次进行明确阐述。

第三，克制是一种成熟的外交表现。虽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但有评论人士认为，大陆的过度反应不过是“虚张声势”，缺乏“实力和信心”。拜登政府应放大这种不安感，以便与某些对中国大陆实力增长有所忌惮的国家产生共鸣。

短期来看，保持克制能防止危机升级；长期来看，可以塑造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盟友信任。

美学者称单靠《芯片法案》难以与华竞争

美国《法律事务》(Lawfare）网站 8 月 8 日登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斯科特• 摩尔（Scott Moore）的文章称，单靠补贴并不能促进创新。要想与中国开展科技竞争，美国应加强在 STEM 领域基础教育、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投资。文章摘要如下：

耗时两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帮助美国更有效地开展对华竞争的两党法案，即《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承诺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研发先进技术，尤其是补贴半导体制造业。尽管该法案雄心勃勃、耗资巨大，但要单靠它实现对华技术竞争可能行不通。技术竞争中，金钱并非一切，补贴往往是鼓励创新的多种方式中最浪费的一种。在刺激技术创新方面，人、文化、制度与金钱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可能会在短期内推动技术研究和生产的进步，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在基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会带来长期利益，而补贴往往不能。第二，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只是部分作用。法案对补贴以及政府行为的过分强调，会忽略其他更节省且有长期收益的方法。例如法案授权补贴半导体制造业 390 亿美元，而人才培养仅 2 亿美元。

为促进美国的创新并在先进技术上与中国有效竞争，立法者需要做的不仅是补贴制造业，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美国需要加大对 STEM 领域 K-12 阶段的教育。政府应重点解决全国 STEM 教师短缺和学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问题。

第二，国会必须让“技术友好领域”(tech-friendly fields）的外国留学生在毕业后更容易在美国工作并获得永久居留权。

第三，美国政治领导人必须停止针对科学家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党派攻击，并对学术自由等基本价值重新作出承诺。

约瑟夫·奈：美国应制定审慎的对华战略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近期登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文章称，美国应制定审慎的对华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美国战略家将其描述为大国竞争中的“节奏挑战”（pacing challenge），认为中国有望成为世界霸主。而一些消极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已进入平台期，“中国梦”的实现可能会受到突发事件影响。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取决于两国各自的战略决策。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时存在许多可能失败的风险，因此，美国审慎的对华战略应该多方考量。

中美两国关系最戏剧性的失败莫过于一场热战。即便美国的总体实力占上风，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军事冲突仍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第二种灾难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妖魔化中国的新常态引发的长期冷战。这阻碍了中美在诸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上的合作。如果美国无法控制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并解决其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也会遭受损失。

成功的对华战略应该关注现实并且谨慎行事。美国虽然无权以民主之名干涉中国内政，但政府仍应捍卫民主、人权这两项吸引盟友的重要软实力。成功的战略始于国内，美国不仅应该积极维护国内民主制度，还应该投资研发以保持其在关键行业的技术优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美国在重组其传统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化并增强联盟合作的同时，还应加强与现有国际机构在规则制定上的互动。

总体来看，如果能避免过度强调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避免误导性的冷战类比，美国能成功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艾利森：台湾问题最有可能成为中美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导火索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 8 月 5 日刊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分析文章称，台湾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导火索，中美双方应该对台湾问题进行管控，防范战争风险。文章摘要如下：

台湾问题可能促使中美爆发热战。尽管中美双方政府都尽力避免军事冲突，但任何微小的意外都可能酿成一场战争。在历史上，即便领导人不希望走向战争，但最终还是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颇多。当前中美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由台湾问题引发的潜在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即便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矛盾也可以被有效管理。政治家们创造了一个受用 50 年的“战略模糊框架”，为海峡两岸民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当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主要源于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大陆具有遏制台独势力的坚定信念，且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第二，美国的两党政治环境刺激美国精英围绕台湾问题做出强硬表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正急于展示谁能提出更严厉的对华政策；第三，自上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大陆军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台海若有战事，美国将面临败局。

如果美国为台湾问题发动局部战争，总统面临战败或扩大战争的决定性选择。若美国升级战争规模，意味着战略武器将被引入其中。美国在核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但大陆也拥有强大核武库，中美将形成“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战略现状。尽管理性的领导人不会选择打核战争，但冷战史说明，许多领导人愿意承受更

大的战争风险，而非让步。

中美软实力竞争并非零和博弈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近期登载了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传播系副教授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的文章称，中美在软实力领域展开了竞争。鉴于两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实践不同，双方的行动是互补而非冲突的。文章摘要如下：

“软实力”，即让别人想你所想。它源于无形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利用国际组织讨论和制定框架的能力。概念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巨大优势不仅来源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来源于强大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以及学者的重视，在中国同样受到热捧。2007 年前后，中国开始大力投资公共外交。中国将“软实力”视为国家崛起的重要助推器，只有得到更多认同，提高全球舆论影响力，才能真正与美国竞争。

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速，软实力也成为了竞争的一部分，中美争相提高本国政治经济模式对他国的吸引力。中美针对软实力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运作模式。在解读上，美国倾向于将本国描绘成自由民主秩序的捍卫者，软实力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而中国更务实，致力于融合文化和商业诉求，在南方世界引发广泛共鸣。在实践上，美国通常依靠商业文化输出。而中国除了向海外提供农业和公共医疗援助之外，还通过教育提高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西方难有市场，但在全球南方获得了巨大成功。据非洲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34 个国家中，近三分之二的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比较积极”或“非常积极”。此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9 年对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好感。

在承认中国在南方国家的相对吸引力和优势的同时，不应将中美之间的软实力竞争视为零和游戏。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软实力之争并非总是针锋相对，在其他国家看来，中美两种软实力形式互为补充。展望未来，中美在提升软实力方面将面临不同的挑战。美国的民主国家榜样形象可能受到国内民主问题的影响。中国务实的软实力做法有可能沦为纯粹的交易主义。疫情之下，中国的隔离政策影响了人文交流，这将如何影响其在南方国家的形象仍有待观察。在软实力领域的竞争与其说是战胜对方，不如说是要克服自己的内部摩擦。

美国外交

外国恐怖主义并非美国面临的核心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网站近期刊登其高级研究员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的评论文章，剖析了击杀扎瓦希里对拜登政府反恐战略的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发动无人机袭击，击毙了“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此次袭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拜登政府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象征意义。对藏匿在喀布尔安全屋内的扎瓦希里实施精确打击再次展示了美国在情报和作战方面的强大能力。但美国是否会借此加强反恐活动仍有待观察。

虽然此次袭击为拜登挽回了一些声誉，塑造了一个坚定的总统形象，但阿富汗恐怖主义问题远未结束。一方面，“基地组织”势头犹在。过去十年，尽管“基地组织”没有恢复到“9·11”之前的作战能力，但它已经广泛延伸到中东和非洲。当地分支机构有强大的能力开展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另一方面，扎瓦希里藏匿喀布尔的事实也说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联系依然牢固。

实际上，外国恐怖主义并非美国面临的核心威胁。自“9·11”事件以来，外国恐怖组织再难对美国本土实施成功的袭击。尽管应对来自这些“圣战”组织的威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恐战略，但美国不该在此问题上自缚手脚。美国面临的核心威胁还包括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其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圣战”威胁。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政治体系功能失调以及白人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对美国的稳定、民主、安全和繁荣带来的威胁也远大于“基地组织”或其他团体的威胁。

美学者称美国应系统性重整太平洋地区的民主现状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近期登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的文章称，美国应系统性重整太平洋地区的民主现状，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试图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这一概念围绕三个关键因素展开：建立自由民主社会、自由管理国内外事务、遵守近几十年来主导国际关系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美国不得不面对地区事务中自由、开放和安

全三者间固有的紧张关系。主权国家通常优先考虑能确保基本安全和生存而不是促进自由和独立的外交关系。

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必须在自由、开放和安全间找到平衡。因此，需要关注太平洋岛国在政治光谱和“民主-专制”二元世界中的位置。就目前来看，包括斐济、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几个国家容易陷入民主-安全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以务实的态度开始考虑其他主权国家的非民主利益并与之结盟。相应地，“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是否也会沦为仅靠口头上的民主承诺来动员战略伙伴的叙事？这取决于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必须以“民主-专制”之间的分野为基准，重新安排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秩序。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应考虑太平洋次区域的动态。该区域包含自由联合国家和许多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具体来看，美拉尼西亚的民主基础薄弱，美国打“民主牌”的收益较少，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除瑙鲁外）此前已打下坚实的民主基础。因此，两者相较而言，后者更值得美国进行民主投资。

美国对太平洋的内外政策通常是割裂的，经常将其在该地区的伙伴和对手错误地划分为“二元对立”。然而，战略伙伴并非简单的同质体，即使是盟友间，各国的安全利益和优先级也存在差异。为避免这样非黑即白的思维，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应充分考虑各方的立场和利益，谨慎思考。

危机对超级大国而言亦是转机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博弈时代。危机固然可怕，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通过外交较量与军事对抗能够洞悉对手意图，厘

清地缘政治竞争的利害关系。危机亦能带来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机会，可以促成倡议与投资，帮助美国在未来旷日持久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站近期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特聘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的文章称，大国竞争时代的危机亦是转机，美国若能善加利用，将有助于其在未来的长期竞争中获得胜利。文章摘要如下：

俄乌冲突破坏了东欧稳定；佩洛西“访台”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严重危机；伊朗、朝鲜的核问题再次将国际社会置于核威胁之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博弈时代。危机固然可怕，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通过外交较量与军事对抗能够洞悉对手意图，厘清地缘政治竞争的利害关系。危机亦能带来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机会，可以促成倡议与投资，帮助美国在未来旷日持久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回首冷战，伟大的设想往往诞生于危机之中。“杜鲁门主义”是为遏制日益崛起的共产主义，“马歇尔计划”是美苏在西欧对峙的产物。这些助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伟大政策，并非深思熟虑、有计划的产物，它们源于危机中的紧迫感和创造力。随着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加剧，危机也会随之而来，但危机同样也是转机，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危机可以暴露对手意图。当年苏联并不满足于其在二战中取得的成果，以牺牲非共产主义世界为代价寻求进一步扩张政治阵营，最终引发冷战。如今的俄乌冲突再次向西方展示了普京的真正意图。

第二，危机可以暴露美国的军事弱点，并提供纠正它们的机会。俄乌冲突暴露出美国及其盟友武器储备的不足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对此，美西方国家应大幅增加关键武器系统和弹药的生产，投资脆弱的国防工业并提高其韧性。

第三，危机可以加速联盟的形成。俄乌冲突不仅消除了瑞典、芬兰对北约的矛盾心理，促使北约再度扩大，还催生了一个新的包括日、韩、澳等国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同理，台海危机也可能会加速遏华联盟的形成。

第四，危机可以打破僵局。俄乌冲突爆发后，一贯步调缓慢的美国迅速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资金。同样的，若台海爆发危机，美国可寻求扩大和加快对台军售和援助计划，简化国内审批程序，加快建设非对称打击能力。

最后，危机是建立政治共识和催生内在动力的契机。美国对华政策经常归于平庸的原因在于，许多使美国更具竞争力的措施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但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而改变，因为无所作为的代价往往更高。此外，一直不愿放弃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也可能因为台海危机改变投资策略。

当大国竞争时，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驾驭危机，并借此发挥出自身优势。

美国应调整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东欧政策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 8 月 8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的文章称，美国是时候收回几十年来对俄罗斯的尊重和谨慎态度了。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的 30 年里，美国的对俄政策不仅没有让俄罗斯为其在国内推行的威权主义和对外进行的反民主活动付出代价，反而牺牲了美国与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东欧策略一方面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是担心冷战甚至热战的重现。如今，俄乌冲突已来到转折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决定，是帮助乌克兰推动谈判，还是目睹俄罗斯重整部队转而投入长期的消耗战。

如果选择优先考虑乌克兰则需要打破美俄乌三方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 1989 年乔治·H·W·布什政府时期。当时，大多数人认同美俄关系是冷战后任何安全结构的基石这一论调。在此基础上，该政府虽然并不反对前苏联国家独立，但却拒绝支持乌克兰的自决权，这导致美国错失了一举两得的良机，即同时适应苏联的衰落和扶持新兴的后苏联国家以防范俄罗斯未来的民族统一主义。

美国追求与俄罗斯建立互惠关系这一目标本身并没错，但在没有成功机会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这一目标无疑是不理智的，也失去了扶持乌克兰成为地区民主支柱的重要机会。美乌关系始终无法升级的原因一部分源于冷战后遗症，另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国内缺少乌克兰问题专家。

美国应当给予乌克兰全面的支持，防止俄乌冲突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旧习难改，拜登政府虽然正缓慢转变态度，但并不足以立见成效。若美国能为乌克兰提供充足的武器，就可以迫使俄罗斯更快进入谈判程序。此外，俄乌冲突扰乱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对此，欧盟已经率先推出了“团结通道”（solidarity lanes）计划，美国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粮食出口问题。

民主复兴是拜登政府内政和外交议程的基石。为了确保民主的胜利，美国必须改变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改善美乌关

系的同时加强与东欧和北欧伙伴的接触和交流。美国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外交政策的方向，才有机会打造一个和平、民主的东欧。

美国政治/其他

民调显示选举人团制度不再受多数美国人欢迎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期发布了该中心研究副主任乔斯林·基利（Jocelyn Kiley）等人撰写的民调分析报告称，美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改变当前选举人团制度。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目前的选举制度导致即使候选人在普选中获胜，仍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选举人团票以赢得总统职位，2000 年和 2016 年大选都是如此。选举人团在最近几次总统大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也使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皮尤对此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有以下几个看点：

大多数民众支持改变总统选举方式。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6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应改变总统选举方式（2021 年该数据为 55%），使全国普选的获胜者赢得总统大选，而 35%的人赞成维持目前的选举人团制度（2021 年该数据为 43%）。

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更倾向改变总统选举方式。与过去几年一样，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80%）比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42%）更倾向于实行全民普选的投票制度。其中，以自由派民主党人尤甚（87%）。

年轻人更支持改变选举方式。民调显示，18 岁至 29 岁的美国人中有 70%支持改变选举人团制度，而 65 岁或以上的美国人中有 56%的人持相同观点。

围绕选举人团制度的党派分歧受政治关注程度影响。在那些“大部分时间”关注政府和公共事务的人中，85%的民主党人支持改变选举人团制度，而只有 24%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对于那些说自己“只是偶尔”或“几乎不”关注政治的人来说，党派差距要小得多，有 74%的民主党人和 59%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支持改变选举人团制度。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开始在种族议题上打明牌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期登载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国际事务教授尼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的文章称，如今的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不再认为需要掩盖其真实信仰，直接树立起种族主义旗帜以吸引潜在支持者。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十年里，全球极右翼领导人通常借助暗语宣扬种族主义。如今，民粹主义领导人不再为了获得权力掩饰其种族主义思想，变得更加明目张胆。在意大利，目前最热门的总理候选人、自称“后法西斯主义者”（post-fascist）的意大利兄弟党领袖乔尔吉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将自己描绘为充满活力的游戏规则重设者，积极宣扬极端的反移民观点。

在美国，特朗普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推向高潮，有几点例证。第一，2017 年夏洛茨维尔集会是种族主义运动的巅峰时刻。第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Doug Mastriano)是一位明确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他拒绝与不公开信奉基督教的媒体沟通，试图利用极右翼社交媒体平台 Gab 进行政治宣传。第三，极右翼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追随者、前风投专家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直接将特朗普的选举失利和枪支暴力归咎于少数族裔，

而其近期赢得了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提名。

长期以来，极右翼利用“文化战争”获得选举优势，媒体大亨则从中攫取利润，这已经毒害了许多人的思想，以致于一些政客认为，公开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 LGBTQ 是通往胜利的最可靠途径。总之，极右民粹主义者似乎终于放下了体面的面具，亮出了种族主义的底牌，揭示了推动其运动的真正力量。

民主党的选民结构和群体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近期，美国生活调查中心（The Survey Center on American Life）网站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民调和公共舆论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克斯（Daniel Cox）的文章称，尽管从总体上看民主党选民数量的变化不大，但其人口结构和群体特征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种族构成。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的种族构成变化颇大。如今，56%的民主党人是白人，21%是黑人，18%是西班牙裔，4%是亚裔或太平洋岛民。而 1998 年，70%的民主党人是白人和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分别占 19%和 8%。

其次，意识形态。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多元，包含了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变得越来越自由。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民主党内保守派（25%）和自由派（28%）的人数大致相当。而截至 2021 年，民主党内自由派比例已达 50%，远超保守派。民主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主要集中在白人、非西班牙裔和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中。

再次，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越来越多的美国成年人不再参加宗教活动。在民主党中，宗教信仰影响力下降的速度要比共和党快得多。同时，民主党的宗教信仰也日益多样化。民主党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极高。在 24 岁以上的民主党人中，48%拥有四年制学院或大学学位，23%拥有研究生学位。而 1998 年仅有 23%的民主党人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位。

最后，代际分歧。过去的几十年间，民主党的平均年龄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98 年，59%的民主党人年龄在 50 岁以下，而到了 2021 年，该比例下降到不足 48%。年龄中位数从 44 岁上升到 51 岁。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代际问题。年轻的民主党人比年长者更自由、更世俗、更支持种族多样性。

民主党选民的变化会影响该党的优先事项及其政策选择，也带来了一些直接的政治挑战。政党领导人不得不与具有不同背景和偏好的群体进行谈判，这使得该党更难形成一种连贯的身份认同，也难以制定一项能迎合不同派系利益的执政议程。

民调网站 538：共和党人的移民政策殃及合法移民

美国民调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8 月 4 日登载 ABC 新闻研究员佐哈·卡玛尔（Zoha Qamar）的文章称，共和党人谈论移民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文章摘要如下：

长期以来，非法移民议题一直是共和党选民的动力所在，尤其是当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后。然而，对非法移民过度关注的事实忽略了美国移民政策的现实变化，即共和党政客正在日益模糊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之间的界限，其言论和政策不仅针对非法移民，也同样涉及合法移民。

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民众关于增加合法移民的支持率总体上稳步上升，这主要归功于民主党的推动。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CGA）2019 年的民调显示，在受访者中有近一半的共

和党人（47%）认为应该减少合法移民。然而，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之间的区别通常并不明确。根据移民研究中心（CMS）报告显示，2016 进入美国的移民中，只有 38%的移民未持合法证件。并且，致使许多在美外国人（62%）沦为非法移民的原因在于“逾期居留”，这意味着他们最初是合法进入美国，但由于文书过期而成为了非法滞留者。

然而，即使存在上述情况，媒体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法移民身上，共和党人似乎也更加关心非法移民问题。根据盖洛普今年 3 月关于“美国人对非法移民的担忧程度”的民调结果显示，68%的共和党人表示“非常担忧”，比持相同观点的民主党人高出 50%。正因如此，共和党政客们在竞选中仍十分重视非法移民这一话题。然而，若是对共和党实际制定的移民政策进行研究后就会发现，其遏制合法移民的政策远比限制非法移民的政策要成功得多。

以特朗普为例，尽管非法移民是其竞选的核心议题，但事实证明，他更擅长实施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2020 年初，美国平均每月绿卡数量减少了 18%，非移民签证数量减少了 28%。特朗普并非唯一提出限制合法移民政策之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已经开始着手通过立法来削减合法移民。例如，大卫·珀杜（David Perdue）提出了《美国增强就业移民改革法案》（RAISE Act），提议限制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政策，还明确将合法移民与经济联系起来，表示将重点考虑高技术移民。

展望 2022 年中期选举和 2024 年总统大选，合法和非法移民仍将是共和党的重要话题。共和党人谈论移民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区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变得更加困难，这反过来也掩盖了围绕移民政策的更多问题。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 辑 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200020
电　　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